

崛起的前奏

——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

王庭岳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责任编辑: 李 锋

封面设计: 孙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崛起的前奏: 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王庭岳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ISBN 7-5012-0684-8

I. 崛… II. 王… III. 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7170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京联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3.75 字数: 323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1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风云际会

- 一、红色“麦加”之谜…………… 1
- 二、初试啼声…………… 6
- 三、沟通外界的牵线人…………… 12
- 四、“朝觐”者接踵而至…………… 19

第 二 章 独树一帜

- 一、外交路线上的国共之争…………… 28
- 二、毛泽东纵论天下事…………… 34
- 三、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者…………… 39

第 三 章 得道多助

- 一、八方呼应…………… 48
- 二、路易·艾黎与边区工合…………… 53
- 三、“保盟”与国际和平医院…………… 60
- 四、加拿大人民派遣来的代表…………… 68
- 五、印度援华医疗队在华北…………… 77
- 六、“西班牙大夫”在中国…………… 83

第 四 章 呼吸相通

- 一、来自西方的和平使者…………… 88
- 二、美国军人华北战区旅行记…………… 94

三、革命者与传教士·····	102
四、东方两大民族的握手·····	108
五、英美学者在晋察冀·····	113
六、访问皖南云岭的外国人·····	118
第五章 骨肉情谊	
一、雪中送炭·····	124
二、华侨回国服务团·····	130
三、陈嘉庚访延纪事·····	135
四、新四军中的菲律宾华侨义勇队·····	143
第六章 力挽狂澜	
一、中国不是捷克·····	149
二、告诉你们美国同胞·····	155
三、云谲波诡 洞察其奸·····	160
第七章 激浊扬清	
一、飞向太平洋彼岸的密信·····	166
二、重访新四军的欧洲人·····	172
三、外国顾问在新四军卫生部·····	179
四、胡志明身陷图圉前后·····	185
第八章 独立自主	
一、周恩来出使共产国际·····	191
二、希特勒即将行动·····	197
三、在延安的苏联人·····	203
第九章 同仇敌忾	
一、中共奇特的武器·····	211
二、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	219
三、以日人反日战·····	224
四、走在火焰上的日本女人·····	233

五、隐居延安的日共中央书记·····	237
第十章 唇齿相依	
一、奋战在白山黑水间的朝中联军·····	246
二、与中共共命运的朝鲜志士·····	251
三、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军·····	256
四、战斗在同一条战壕里·····	260
第十一章 胸有甲兵	
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269
二、有战略眼光的中共领导人·····	274
三、中共倡建太平洋反日阵线·····	280
第十二章 济困扶危	
一、港九国际大营救·····	286
二、北平逃出的西方人·····	294
三、从天而降的盟友·····	302
四、我从中国解放区回来·····	307
五、美国当局向中共感恩·····	313
第十三章 内拒外争	
一、是谁主宰中国人的命运·····	319
二、中共也应分得租借物资·····	324
三、中共设想的战后国际新秩序·····	330
第十四章 坦诚相见	
一、中外记者参观团的由来·····	337
二、毛泽东答中外记者问·····	343
三、外国记者心目中的八路军·····	350
四、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	355
第十五章 求同存异	
一、中共真正外交的开端·····	361

二、迪克西使团延安印象记·····	370
三、毛泽东说：中共决不改党名·····	375
四、缺乏诚意的赫尔利·····	380
五、中共领导人的访美计划·····	387
六、中共取得旧金山会议的席位·····	392
七、巨星殒歿 普天同悼·····	397
第十六章 通力合作	
一、敌后的盟军情报组·····	403
二、中共为盟军建飞机场·····	409
三、美国军人延安取经记·····	414
结束语 ·····	420

第 一 章

风 云 际 会

一、红色“麦加”之谜

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换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边的人间脉搏……^①

就在这一天——1936年6月3日，漆黑的深夜里，从北平崇文门外附近的盔甲厂13号小院里走出一个外国人。他随身带着简单的行装，一副出远门的打扮。早就等候在院门外的一辆黄包车，

^①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见《斯诺文集》（二），第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拉着他直奔前门火车站方向……

几刻钟后，他登上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南去的列车载着他离开北平，呼啸着向黑色的原野驶去……

几十天后，他叩开了被称为“红色中国”的神秘大门——安塞，前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在那里，他受到了红色中国全体内阁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的欢迎与接见。接着，他又走访了历经磨难的红军各部，踏遍了陕北苏区的山山水水……

几个月后，当许多中外报刊纷纷报道他失踪并“证实”他已被红军枪杀时，他突然出现在“另一个中国”——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满面春风，向人们侃侃叙述他在中国西北腹地的见闻，展示他在苏区拍摄的一幅幅照片……人们震惊了，一条世界头号新闻产生了……

创造这条爆炸性新闻的外国人，就是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苏里河畔的堪萨斯城。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中学毕业后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开始了他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并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太阳报》初露头角。1928年6月，他怀揣着新闻学院院长给上海的《密勒氏评论》周刊主编鲍威尔的一封信，经夏威夷、日本抵达中国上海，当上了《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助理编辑，后又兼任《纽约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或记者。从1930年起，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各地重要城市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等。“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1933年的热河战争。此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文。

斯诺来中国前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激烈的动荡。1927年

的上海工人大起义，接踵而来的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血腥镇压，华南许多省份发生的农民暴动、城市工人起义，红军的成立，红色根据地的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以及日本侵略军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对这一切都怀有强烈的职业敏感性。他最为关注的是那些关于苏区、红军不断胜利、不断失败的消息。在上海期间，他所结识的宋庆龄、鲁迅、中共地下党人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曾断断续续地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将士是一批出类拔萃的人，他们在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进行着艰苦抗争……他内心为之激动、感慨。但是，在这同时，他又从国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布告、通缉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战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以及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口中，陆续了解到另外一种说法，他们总是百般丑化、诋毁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切使他不能不隐隐约约地感到：所谓的共产党和红军，只不过是一股“土匪”，打家劫舍，无恶不作……这许许多多的、截然不同的说法，使他为之困惑，百思不得其解。过了一年又一年，时间老人为他提供了便利。他慢慢地发现，国民党对外公布的一切总是破绽百出，如在报道“残匪已大部被歼”后又陆续报道“共匪军一股在向某地流窜”，要某地“严加防范”、“清剿”；对中共领袖毛泽东，南京政府曾经一再宣告他被打死了，可是没有几天，报上的新闻栏里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后却又贴出悬赏数百万元的重金以捕获朱德的通缉令或布告等等。前后矛盾之处，他们也从未发表过辟谣的声明。原来是国民党在大言不惭，自欺欺人！

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

国的一切到底怎样？对热心的人们提供的现成答案，斯诺总是不满意，并产生了疑问。因为“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去过红色中国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斯诺一次次下决心要去探个究竟，但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严酷的现实。因为在红色中国那边，“九年以来，遭到铜墙铁壁般的严密封锁而不为世人所知，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城墙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

1935年12月，北平城受到了弥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浸染。在燕大执教的斯诺兴奋地耳闻目睹到：东方日本帝国对中华民族的威胁，激起了北平居民、特别是愤怒的青年学生的示威抗议；北平的全部砖石屏障也未能阻挡住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华北、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一带进发并宣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的消息。一向静谧的燕大校园里，突然爆响起一阵鞭炮声和清脆的“二踢脚”，许多进步师生在热烈庆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红军抵达陕北的讯息和燕大、北平青年的激情，又勾起了斯诺脑海中的万端思绪，千万个“未获解答的问题”铺天盖地地直向他扑来，充塞和胀痛着他的脑袋。

关于红军的：红军是否存在？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红军是反共的人们所说的充其量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吗？或是共产国际刊物所说的有50万兵力吗？红军的武器弹药从哪儿来？红军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红军的士气怎么样？红军官兵真正平等吗？红军是怎样训练的？红军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红军没有自己的工业，没有大炮、毒气、飞机、金钱，没有国民党同他们作战时所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自己队伍的？红军战士是那样英勇，连他们的敌人也承认，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红军运动的基础是什么呢？红军的希望、目标、理想是什么？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10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该

如何解释呢？红军中有没有俄国军事顾问？红军……

关于苏维埃和苏区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

关于中共和红军、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

斯诺还特别关心着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有没有它的“对外政策”呢？

所有这些问题，哪怕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由于存在着争议，由于总是道听途说，未能“眼见为实”，也就变得极为复杂和神秘起来。斯诺感到：“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传说尽管是十分混乱，在许多和斯诺一样不满足于国民党或共产党单方面宣传的在华外国人中，却极少有人不听国民党当局“诚心诚意”的告诫，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弄清与己无关紧要的事。与众不同的斯诺，却怀着“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了”的心情，于1936年6月初毅然踏上了前往“红色麦加”——陕北苏区之路。

从1936年6月下旬起至10月中旬，斯诺在苏区参观访问近4个月，途经10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考察。离开苏区后，他在国内外大量宣传报道苏区的一切。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新共和报》、《纽约太阳报》、《美亚》及《太平洋事务》杂志，英国的《每日先驱报》等报刊，纷纷发出斯诺采自陕北的报道、照片。1937年7月，斯诺记载苏区之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先在英国出版，接着被译为法、德、意、俄、日、中等十几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斯诺揭开的中国“红色麦加”之谜，震动了国际社会。人们称他的苏区之行是“本世纪任何一位记者都无以企及的最伟大的

壮举”，他对苏区的报道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是“多年来新闻工作的最大成功”。侧重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人们则称斯诺的壮举“开辟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略作研究的人们可能还会发现：这一事件的意义决不止于这些，它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敲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开始以“中国新人”的姿态跨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二、初试啼声

斯诺访问苏区时，中国共产党总部驻在保安，1937年1月迁至延安。不论保安还是延安，都有一段古老的文明、昌盛史，但在千百年来的无休止的战争、匪乱和大自然强加的各种灾害的摧残下，这里已显得一片贫瘠、荒凉，连人也难找到更好的栖身之处。除了那数不清的令人追忆和生出无限遐想的古代文明遗址外，不是满眼的黄土，就是那无数张着大口的窑洞。中国共产党总部的不算庞大的机关，就住在这名闻遐迩的土窑洞里。所谓的窑洞，就是在陡峭的土崖下，掏挖出进深一丈至几丈的可容人进出的拱形的洞。从远处看来，在一面面黄土高坡下，层层叠叠的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洞口，既像蜂的窝巢，更像一只只瞪着的大眼，凝视着远方，俯瞰着整个人间世界。作为它的主人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也具有与它同样的特征。尽管他们远离现代社会，在偌大的中国也举步维艰，以至终日难得一饱，但却不是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和无所作为的一群，他们积极进取，时刻在准备向外部世界冲刺。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发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从此有了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初，中国社会

虽仍闭关自守，但俄国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社会的精英得到了改革社会的思想武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她一经诞生，即开始以自己的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来影响中国和国际的事务。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中共不仅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还领导人民掀起一次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图改变中华民族遭受别人奴役的地位。但是，中共第一次比较系统而具体地提出她的外交方针政策，却是10多年后的事。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人从此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至1931年11月，已建立中央、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等多块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红色政权。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根据这一原则，大会还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共为六部分。主要内容是揭露一切帝国主义帮助“他们的走狗——国民党军阀”血腥镇压中国劳苦大众的罪行，阐释苏维埃政府为维护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外交基本立场、具体主张及实施办法等。其中第二部分是关于“为着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保障中国的完全独立，苏维埃采取……的基本办法”。具体内容是：

(1)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租界、海关、银行、邮电、铁路、航业、商店、农场、以及其他企业归国有。

(2) 完全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空军，没收帝国主义的一切军事建筑，(航空局)企业归国有。

- (3) 废除领事裁判权及一切治外法权。
- (4) 取消一切外债。
- (5) 公布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订立的一切秘密条约。
- (6) 废除外人在华的投资经营、居住一切特权。
- (7) 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驱逐一切的教徒和牧师。
- (8)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教堂、学校、游戏场、俱乐部及文化建筑。
- (9) 没收外国资本家在华的一切房屋财政（产）及投资（无论合股或私人的）。^①

这些条款的内容是中共过去提出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口号的进一步具体化。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的反帝决心，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决不听从和屈从于别人、甘愿将自己和民族的命运交给他人摆布的政治集团。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意识到，在进行艰巨的国内革命战争的同时，对外要战胜强大的各帝国主义，决非轻而易举，必须讲究斗争的策略。这点在仍处于襁褓中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已有明确体现。如其第四部分关于对苏区境内的外国资本生产、经营等问题，并没有作禁止或没收的规定，仅采取加强管理等方面的措施，以“在目前……执行”。其中规定：“苏区境内外人一切企业，必须实行苏维埃劳动法令上一切规定（如8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罢工、集会、结社、成立工会的绝对自由），实行工人监督生产”；“苏区境内外人一切企业工厂（除海关、铁路、邮电外），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日起，就将资本数量、内部情形呈报苏维埃政府，完全遵守苏维埃

^①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86年第11期。

政府的法令，继续营业，苏维埃政府派人参加管理”；“一切外人在苏区境内的营业，必须向苏维埃政府缴纳定数的营业的数税”等等。^①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决欲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成了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而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则呈下降趋势。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除于1932年4月15日发布宣言对日宣战外，还根据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适时修改了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逐步放弃过去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出区别对待日本法西斯侵略国家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新的外交政策。

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一经成立，即宣布了新的“外交政策”：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并不是不择目标而随便放矢的，谁愿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又利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抗日讨伐卖国贼的斗争者，苏维埃政府均愿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②

①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1期。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62—63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共产党为切实实施外交政策，曾在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设立“外交人民委员”，委员王稼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又设置了“外交部”机构，部长王稼祥，后为博古。以至斯诺在访问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时，发现“在这个尘土飞扬、条件艰苦的小城里，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家机构，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防部、教育部，部署有关工作”，甚至“外交部”还有自己的用于接待来宾的“招待所”，它“是一个有四间小砖房的院子”。^① 斯诺也可能是住进该招待所的第一位“外国贵宾”。

中国共产党虽确立了系统的外交方针政策，但在国内革命斗争的特殊形势下，还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反国民党军事围剿斗争形势的急转直下，共和国疆界的日趋缩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跋涉……数年间世事发生沧桑巨变。加之中共的主要力量限于内地活动，四周受到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封锁以及国民党对外歪曲宣传，致使外界对中共缺乏起码的了解。在这种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下，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似乎还停留在政策宣布阶段。

但是，在斯诺访问苏区之前，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也曾和屈指可数的数名外国人密切交往过。他们是：李德，德国人，本名是奥托·布劳恩。30年代初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初在上海，1933年转赴中共苏区，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1935年秋，他跟随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洪水，越南人，原名武元博。1924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经胡志明推荐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参加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往泰国。1929年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长征后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武亭，朝鲜人，红一方面军炮兵团的缔造者，并任第一任团长，1934年率炮

^① 《斯诺文集》（一），第191—192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兵团参加了长征；毕士悌，朝鲜人，长征期间为“红色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参谋长，抵陕北后，在黄河边的一次战斗中牺牲；郑律成，朝鲜人，著名音乐家，参加了红军长征……这些外国人，除李德外，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仅是红军中的一名普通战士，而不是客人，与中国人民有着同样遭受民族剥削、压迫的命运和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要求，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了同一条战壕里。

富于戏剧性的事是，共产党人还与几名被称为“帝国主义分子”的外国人打过交道。他们是被红军俘获的外国传教士。

1934年5月8日，贺龙指挥红三军一举攻克川东南黔江地区的彭水县城。红军战士从一个小学校的夹墙中捉到一名叫史敬信的美国人。史敬信又名史敬信，早年随传教的父母来华。“九·一八”事变后，史敬信到彭水县传教，是四川境内20多名外国人中的一个。红军战士捉住史敬信后，都认定他是“帝国主义分子”，立即把他捆绑起来。解绑审讯后，怕史敬信受伤害，影响红军声誉，便将他要到军部。史敬信整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惧怕红军杀他。为打消他的顾虑，贺龙多次与他谈心，解释中共和红军的革命政策，生活上对他百般照顾。在戎马倥偬之中，贺龙还常找史敬信下象棋，逐步沟通了感情。当贺龙得知史敬信为他的夫人和儿子的安全担忧后，尊重他的意愿，派人把他们专程送到武汉。史敬信为此感激不已，并主动要求为红军贡献他的一技之长，用他的医术为红军战士治病、治伤，用他熟练的照相技术为红军照相等。贺龙十分满意，特委任史敬信为红三军军部秘书。几个月后，贺龙率红三军西征，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史敬信因不适应红军生活，又思念夫人和儿子，要求离开红军。贺龙满足了他的要求，发给了充足的路费，派人把他送到西阳龚滩上船，顺利抵达武汉。